

# 施特劳斯的 现代性批判理论研究

---

A Study of Leo Strauss' s Critical  
Theory of Modernity

---

蒋小杰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 施特劳斯的现代性批判理论研究

蒋小杰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陈寒节

责任校对:湖 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施特劳斯的现代性批判理论研究/蒋小杰 著. -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4.12

ISBN 978-7-01-014150-3

I. ①施… II. ①蒋… III. ①施特劳斯, L. (1899 ~ 1973) - 政治  
哲学. IV. ①B712.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59607 号



### 施特劳斯的现代性批判理论研究

SHITELAO SI DE XIANDAIXING PIPAN LILUN YANJIU

蒋小杰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龙之冉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2014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3.25

字数:362 千字 印数:0,001-2,000 册

ISBN 978-7-01-014150-3 定价:55.00 元

邮购地址: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 总 序

### 一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在西方,由于经济滞胀和政府失败的出现,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政府管理改革运动。这场政府改革运动随之在世界范围展开。至今,仍在世界范围内以特有的方式走向深入。

从政府管理的角度看,这场政府改革运动与传统上的政府改革最大的不同,不仅仅在于基于现实条件下更加深入地认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确定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职能,即解决政府干什么的问题,更在于在行政职能的输出方式,即对政府的行政方式进行探索,着重解决政府如何干的问题。这一场政府改革解决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履行好自己的职能的问题,相当程度上是整个改革的一个主要内容和重大突破,其基本逻辑,是在强调政府管理的目标与价值的基础上,加强对公共产品属性的认识,确认了私人和市场参与公共产品生产和提供的必要与可能,进而创新了政府管理的方法与技术,在现实中整合社会资源以满足公共需求,<sup>①</sup>从而回应了公众基本生活需求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治理了传统的政府难以应对的问题,即政府机构的“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

---

① 崔运武:《当代公共产品的提供方式与政府责任》,《思想战线》2005 年 1 月。

政府存在的基本要求,就是处置公共事务以满足公众需求,促进社会的存在和发展,而政府管理公共事务的方式,就是公共管理模式,它由公共管理过程中各公共产品提供者功能的定位、参与程度和参与方法等基本要素构成。在人类已有的公共管理实践中,主要出现过在公共产品的提供中政府为主并有限投入的公共管理保护模式、政府全面负责乃至完全垄断的干预模式,政府与社会和市场合作的市场模式。<sup>①</sup>因此,公共管理模式本质上是在公共管理过程中存在或可供选择的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分工方式。无疑,自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第一次世界经济危机以后,以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干预为起点和标志,随着行政国家的出现,在政府作为公共事务主要甚至是唯一管理者的情况下,现实的公共管理模式就是典型的干预模式或垄断模式。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期以来,现实政府管理的变革,现实的结果就是公共管理模式的变革,公共管理市场模式的出现和成长。<sup>②</sup>正是在这一现实变革的基础上,基于理论与实践的互动,尽管人们对当前是否已有一个不同于传统的公共行政的新的公共管理理论的出现存在不同的观点,但可以肯定的是,正是现实变革的推动和新的公共管理理论的迅猛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基于对范式的深入的理解,认为即便不提公共管理已是一个新的理论或学科,但至少已是一个正在成长的新的研究范式。这一点,在我国,从1990年代中期教育部规定的学科专业目录的调整,以及近期社会科学研究及管理部門的及时调整,也足以说明。

在当代中国,自1993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展开以来,可以说正是得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展开和深入,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确立,公共管理模式的转换已成为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进程。概言之,这一客观进程的内在逻辑是,一方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导致了公共需求的日益丰富和复杂,对政府公共管理的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另一方面,正是随着建立社

① 郎佩娟:《公共模式研究,政法论坛》,《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卷第1期,2002年2月。

② 崔运武:《公共事业管理概论(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二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展开和深入,是使作为公共管理模式从干预走向市场的重要因素——以民间组织或非营利组织为基本组织形式的社会(公民社会),相当程度上从无到有,不断发展,而党中央和国务院及时地认识了当代中国公共需求的发展变化,把握了公共管理发展的内在逻辑,因而随着改革的深入,提出必须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要求来确定政府职能,必须大力培育和发展社会中介组织,并且制定了一系列促进民间组织发展的方针和政策,要求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提出要努力提高干部和公务员的现代公共管理素质,建立一个既与当代公共管理发展总体趋势相一致,又符合中国特点的新型公共管理体制。一句话,当今中国,公共管理模式的转换应该已是一个不争的现实。

正如同当代西方的“新公共管理”在实践上与传统的公共行政或说公共管理有明显的不同,因而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中形成了对传统的公共行政理论进行重大变革,进而形成“新公共管理理论”一样,当代中国公共管理模式的转换作为一种在中国出现的客观现实,一种在中国未曾有过新的公共管理实践,它为能够对这一实践做出解释并做出进一步改革导引的理论的构建提出了要求。正因为如此,在当代中国的社会科学领域,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公共管理研究已成为一个理论热点,一个正在探索的理论:面向现实的重要领域。

## 一

在当代中国,对公共管理理论的探索,我们认为基本目标有二:

第一,总结研究当代世界的公共管理变革和理论发展。具体言之,即审视当代世纪范围内,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政府管理改革先行国家公共管理改革的实践,总结其经验和教训,研究其新公共管理理论之所以产生的动因、理论发展的脉落,如从管理主义、公共选择理论,到新公共管理理论,再到治理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内在的发展逻辑与现实影响因素。在把握当代世界范围内公共管理变革的基本趋势,追踪理论发展前沿的基础

上,探求公共管理中具有普适性的因素,本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原则,促进当代中国公共管理变革及理论的发展。

第二,探索有中国特色的,能对中国公共管理实践有解释、说明和预测的公共管理理论。当代中国的公共管理,是对当代中国公共事务进行协调和控制的过程。这一过程是在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在当代中国特定的社会经济发展条件下,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展开的,是公共管理有中国特色的一种管理模式。因此,对当代世界范围内公共管理理论的追踪和研究,归根到底,就是要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理论,尤其是要通过这一理论的探索和建构,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高速而持续地增长,社会稳定,民主进步,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得到满足,公众生活质量不断提高的这一“中国模式”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和说明,为未来的进一步发展基于公共管理做出有价值的参考的预测。

如何展开这一探索,从理论建构的角度看,我们认为最基本的就是要基于学科综合的基础上来进行。当代公共管理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正如人们所公认的,当代正在成长的公共管理理论,它的关注焦点由“内部取向”转变为“外部取向”,由重视机构、过程和程序研究转到重视项目、结果与绩效的研究,从而使战略管理、管理的政治环境、项目执行、绩效评估、公共责任及公共管理伦理成为核心问题;它倡导的管理理念,其中心问题的“如何提供公共利益和服务”,它提供的一整套管理的方法和技术,则是十分注重在处理公共管理问题尤其是政府与市场、企业与社会关系时,提供一整套不同于传统公共行政学的新思路与新方法。

而这一切之所以成为可能并形成一种较完整的知识体系,则是由于它的知识基础,即公共管理学作为一种广泛和综合的知识框架,把当代经济学、管理学、政策分析、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知识和方法融合到公共部门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的研究中。因此,要追踪研究当代世界的公共管理知识,尤其是要建构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公共管理理论,必须走一条基于以政府为主要研究对象,但又不局限于政府,以公共行政学为基本视野,但

又必须同时关注相关的多学科,即基于以公共事务管理为核心,基于公共管理又必须逸出公共管理,逸出公共管理又必须回归公共管理的多学科研究路径。

### 三

云南大学在国内对公共管理理论的探索者的行列中,不是先行者,但肯定是一个积极的、孜孜不倦的参与者。

云南大学有较悠久的历史和政治学和行政学的研究传统。1923年云南大学正式建立后,即于1925年建立了政治学系,展开了政治学和行政学的探索。新中国成立后,云南大学的政治学和行政学走过的是和其他兄弟院校一样的历程。改革开放后,云南大学迅速恢复了政治学学科,并于1980年代初结合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开办了少数民族干部行政管理大专班。这一行政管理干部大专班沿至上世纪90年代末,在为云南省培养了大批合格的素质不断提高的少数民族行政管理干部的同时,也促进着我们对行政管理理论和教学的探索。1986年,云南大学获得了政治学理论硕士授权,即在这一专业中根据当时学科划分的要求,开设了行政学方向,培养行政管理方面的高级专业人才。随之,在国家学科专业调整,明确地建立行政管理专业后,云南大学先后获得了行政管理的本科专业和硕士点,开展了行政管理的专业教育。

1999年,世纪之交,世界范围内公共管理模式的变革和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步步深入,使正在成长的公共管理学科,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蓬勃生机。针对云南省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感觉到了时代的脉动,以及公共管理这一高度整合的新兴学科必将成为社科领域的一个显学,一个极为重要的人才培养基地的巨大需求,云南大学依托学校既有的相关学科优势资源,以原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系为基础,于1999年7月正式建立了公共管理学院,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也得以成为全国第一个正式建立的公共管理学院,从而使我们对公共管理理论的追踪关注,对新型的具

有公共管理理念、掌握当代公共管理技术和方法的多学科的交叉型、复合型、应用型的人才培养,有了坚实的学科平台和新的人才培养条件。

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建立后,我们积极追踪公共管理理论,展开公共管理学科的建设。我们的建设战略,一是以行政管理学科建设为基本支撑,二是积极将教学与研究相结合,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将科学研究与教学研究。如此,九五期间,行政管理学科被列为云南省重点建设学科。在复旦大学等高校的支持下,我们行政管理重点学科建设获得了极大的发展,获得了一大批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基金、教育部青年教师奖基金、国家新世纪重大教改项目等,支撑了整个学科建设,使学科力量不断得到发展,于2003年获得了MPA教育授权,2005年获得了行政管理博士授权,并建立了省部共建的公共管理实验教学中心。

“十一五”伊始,得益于正在深入发展的改革现实对公共管理的需求,基于我们从九五开始的以行政管理为基础的学科建设,以公共管理学科建设为目标——一个以公共管理为核心,一个更加综合的学科整合的建设,即公共管理学科建设,被列为云南省“十一五”重点建设学科。我们基于公共管理的学科特点和基本内涵,确定了公共管理理论与公共事业管理、公共政策与地方政府治理、公共经济与政府理财、区域高等教育发展与管理、电子政务五个建设方向,从更宽广的视野或学科入手,依赖于以往建设的基本路径,展开了新的积极探索。而在“十二五”即将启动之际,根据以项目带动学科加强学科建设的相关要求,我们的“区域公共服务的体制与技术及公共危机管理能力研究”项目,被列为云南大学“211”工程三期重点学科建设项目,从而使我们对公共管理理论的追踪和探索,有了新的更高的平台。

为了记录和展现我们探索的结果,我们计划将近期比较成熟的成果付梓出版。当然,尽管当今世界已是一个信息社会,资讯的传递和使用已非传统社会可比,但由于原有的学科基础和研究力量,以及地域等条件所限,我们对当代公共管理理论的追寻和探索,难免前瞻与后顾并存、深刻与肤浅共融。但我们以为,对在一个诱人的,但实际上又充满艰难、困惑,迷宫般的思想殿堂里的探索者而言,或许同样重要的,不仅仅在于所得,还在于有一种

为理想而追求的锲而不舍的探索精神,一种为中国公共管理理论发展贡献一得之愚而带来的创造的欢乐。

是为序!

崔运武

2010年1月5日于昆明

## 序：走出观念主义的怪圈

俞吾金

记得中国古人有“文如其人”的说法。事实上，在文字与作者之间做比较，本身就富有诗意。当蒋小杰把他的厚实的、沉甸甸的博士论文《施特劳斯的现代性批判理论研究》放在我的桌子上时，我油然而生的，正是这样的感受。与某些思想上缺乏定力、观点上随波逐流的博士生不同，蒋小杰从一年级做开题报告起，就明确表示要把列奥·施特劳斯的哲学思想作为自己博士论文的选题。有趣的是，他一条道走到底，从未改变过自己的初衷，真有郑燮所说的“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味道。

蒋小杰治学，不光有明确的意向，也有顽强的意志。众所周知，施特劳斯的研究资料浩如烟海，要从中理出头绪来已属不易，更遑论形成自己独立的、批判性的见解了。然而，蒋小杰并没有知难而退，他集中思想，心无旁骛，一本接一本地阅读着相关的资料，终于找到了“政治的哲学”（political philosophy）这个重要的切入点。事实上，近年来哲学博士论文的主题越来越多地聚焦到实践哲学，尤其是政治哲学上，因为人们在探讨任何哲学问题时都无法回避以下双重关系：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二是人与社会的关系，而第一重关系又是以第二重关系为基础和出发点的。因为人并不是赤裸裸地、直接地面对自然界的，而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媒介才与自然界发生关系的。而在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中，尽管经济关系起着基础性的作用，但真正体现人之为人的尊严和高度的却是政治关系。正如美国政治哲学家利普塞特所说的，人首先是作为政治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而蒋

小杰之所以把自己的博士论文的主题聚焦在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上,其目的正是要把握这个最重要的思想维度,并通过它,进一步探寻并守护人生的价值和意义。

那么,究竟从何处着手去探寻施特劳斯政治哲学的珍宝呢?经过深入的阅读和反复的思索,蒋小杰决定把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置于现代性语境中加以考察,他这样做的主要理由是:一方面,要对政治哲学获得整全式的理解和把握,就应该找到一个与之相匹配的观念,毋庸讳言,“现代性”(modernity)正是这样一个具有整全性的观念。事实上,施特劳斯正是把以进步观念为引导的观念整体理解并阐释为现代性的。另一方面,政治哲学的危机也深藏在现代性危机中。只有从价值的层面上复兴古典政治哲学中的合理元素,恢复启示与理性或哲学与政治的平衡,才能告别虚无主义、走出现代性的危机。

毋庸讳言,在“观念主义”(idealism)<sup>①</sup>的语境内,施特劳斯关于现代性和政治哲学的理论似乎是可以自圆其说的。或许正是出于这方面的原因,施特劳斯的现代性和政治哲学理论,就像马克斯·韦伯倡导的“新教伦理”、雅斯贝尔斯推重的“轴心时代”理论一样,作为观念主义的代表作,获得了众多的追随者。然而,观念主义者正是以黑格尔所主张的“现实和观念的同质性”(homogeneity of actuality and idea)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和出发点的。换言之,他们把观念上的东西与现实生活中的东西直接地等同起来了,以为在观念上或书本中出现的東西,也必定会在现实中出现。事实上,要拨开观

---

① 在英语中,idealism 这个名词通常拥有以下三个不同的含义。第一个含义是“唯心主义”,它主要关涉政治、宗教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内容;第二个含义是“理想主义”,因为 ideal 可以解释为“理想”;第三个含义是我们在文中使用的“观念主义”,因为 idea 可以解释为“观念”,而观念主义就是试图完全撇开现实,只从观念(包括文本上的思想)的被接受、被批判或被抛弃来阐明现实生活的变化。马克思曾经辛辣地嘲讽过这种观念主义:“有一个好汉一天忽然想到,人们之所溺死,是因为他们被关于重力的思想迷住了。如果他们从头脑中抛掉这个观念,比方说,宣称它是宗教迷信的观念,那么他们就会避免任何溺死的危险。”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6页。

念主义的迷雾,看清楚现实生活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并揭示出现代性的秘密,就应该从黑格尔所主张的现实和观念的同质性返回到康德所主张的“现实和观念的异质性”(heterogeneity of actuality and idea)上。其实,只有认可这种异质性,现实生活中真实发生的东西才会向我们敞开。遗憾的是,施特劳斯还没有自觉地意识到这种异质性,并视之为自己反思的出发点,因而在某种意义上,他仍然在观念主义的旧靴子里打转。

首先,像其他近代政治哲学家一样,施特劳斯也喜欢侈谈 natural right 这个含糊不清的观念。<sup>①</sup>事实上,在我看来,不管人们如何理解并翻译这个词组,只要他们把“自然”与“法”、“权利”或“人权”放在一起,逻辑上就是自相矛盾的,因为“法”、“权利”或“人权”这类观念永远不可能在“自然”中形成,因而也不可能在自然的语境中被使用,而只可能在“社会”的语境被构成并被使用。在这个意义上,说“自然法”、“自然权利”或“自然正当”,就像说“方的圆”或“木的铁”一样,本身在逻辑上就是不自洽的,因而也是无意义的。

其次,施特劳斯试图通过对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古典政治哲学的回归来挽救现代性面临的危机,然而,这种回归也注定是不会成功的,就像柏拉图在叙拉古的遭遇一样。即使从政治哲学家的理念上来看,柏拉图关于“哲学王”和共和国(republic)的理想也是不切实际的,犹如马克思所批评的: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分工被说成是国家的构成原则,就这一点说,他的理想国只是埃及种姓制度在雅典的理想化。<sup>②</sup>

由此可见,无论是施特劳斯对柏拉图政治哲学的回归,还是他对马克思所说的“原始的丰富性”或“埃及的肉锅”的留恋,都无法真正地破解现代性的困局和危机。

最后,我们发现,施特劳斯对现代性危机的分析还未深入到人的本质性

---

<sup>①</sup> natural right 这个英语词组有各种不同的译法,如“自然法”、“自然权利”、“天赋人权”等,蒋小杰和另一些学者主张把它译为“自然正当”。毋庸讳言,right 确实蕴含着“正当”的含义。

<sup>②</sup>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05—406页。

的维度中去。在我看来,要使这个维度向当代人的意识敞开,就必须先行地区分“人性”(human nature)和“人的本质”(human essence)这两个内涵殊异的概念。前者指人的自然属性,用中国哲学的术语来表达,就是“饮食男女”;后者则指人的社会属性,用马克思的话来表达,就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毋庸讳言,人性作为人与生俱来的自然属性,是不会变化的,但人性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表现形式是会变化的;与此不同的是,人的本质是在后天的社会环境中形成的,因而是会变化的,也是可塑的,而这种可塑性正是借助于宗教、哲学、政治法律、伦理道德、艺术和审美观念等才得以实现的。于是,我们对现代性危机的反思,又通过对人的本质形成机制的反思而转化为对上述领域中流行的观念的批判。诚如康德所指出的:

我们的时代在特别程度上是一个批判的时代,一切都必须受到批判。宗教想借口它的神圣立法、想借口它的尊严,试图避免批判,可是,这样一来,它们恰恰就引起别人对它们的正当的怀疑,而不能要求人家真诚的尊敬了,因为只有受得起自由和公开考查与考验的东西,理性才给以真诚的尊敬。<sup>①</sup>

尽管康德自觉地意识到了现实和观念的异质性,从而为破解现代性危机提供了新的思维进路,然而,我们发现,康德所倚重的始终只是单纯思想领域里的批判活动(critical activities)。也就是说,这个思想上的巨人归根到底仍然是观念主义的囚徒。正如莎士比亚在他的《十四行诗》中所写的:

我是你的囚徒,  
我和我的一切都必然任你摆布。<sup>②</sup>

在我看来,要走出这个观念主义的怪圈,或许应该记住马克思下面的教诲:

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

---

①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韦卓民译,AX ii。

② 参阅《莎士比亚全集》第11卷(十四行诗),朱生豪译本。

批判。<sup>①</sup>

我们应该学会把“武器的批判”(weapon's criticism)与“批判的武器”(critical weapon)严格地区分开来。归根到底,真理既不在柏拉图所创立的“理念论”(theory of idea)中,也不在亚里士多德所倡导的“实践智慧”(phronesis/practical wisdom)中,而是在马克思所开创的“实践唯物主义”(practical materialism)中。

是为序。

俞吾金

2014年7月12日于沪上东方文苑

---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3页。

## 著作缩略语

LAM - 古今自由主义

NRH - 自然正当与历史

OT - 论僭政

PAW - 迫害与写作艺术

PL - 哲学与律法

PPH - 霍布斯的政治哲学

RCPR - 古典政治理性主义的重生

SCR - 斯宾诺莎的宗教批判

TM - 关于马基雅维利的思考

WIPP - 什么是政治哲学

PSM - 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

EMM - 门德尔松与莱辛

HPP - 政治哲学史

RCH - 霍布斯的宗教批判